



山西历史文化丛书 (第十五辑)

总主编/李玉明

山西考古学文化与中国华夏文明

侯毅 / 著

山西的考古学文化有其明显特色。旧石器文化和新石器文化，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的基础；晋文化为华夏文明的主干及继承发展者而融入汉文化的洪流中；北朝文化随着民族大融合的趋势与汉族文化相融合；在中国古代文明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山西春秋电子音像出版社

责任编辑:刘冬梅

复 审:余超英

终 审:董高怀

山西历史文化丛书(第15辑)
山西考古学文化与中国华夏文明
侯 毅 著

*

山西春秋电子音像出版社出版发行
030012 太原市建设南路15号 0351-4922123
新华书店经销 太原市新华胶印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5.75 字数:300千字
2005年6月第1版 2005年6月山西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套)

*

ISBN 7-900362-60-6
G·24 定价:(全套10册)30.00元

《山西历史文化丛书》编委会

顾 问：王 谦 李立功 赵雨亭 王庭栋 任继愈
 姚奠中 申维辰 张 颌

主任委员：李玉明

委 员：（按姓氏笔画为序）

马玉山	马志超	于贵卿	于崇良	王克林
王志超	王宝库	王灵善	王振芳	王家壁
牛崇辉	田中仁	冯素梅	任茂棠	刘 巩
刘在文	刘纬毅	刘振华	刘晓丽	成葆德
齐荣晋	李元庆	李东福	李锐锋	吴广隆
宋丽莉	杨二怀	杨子荣	李建峰	张国祥
张捷夫	张鸿仁	罗广德	陈长禄	胡存悌
赵曙光	郑建国	降大任	郭维明	高 可
高专诚	陶正刚	柴泽俊	秦海轩	梁俊明
谢 恺	董永刚	董占锁	董瑞山	楚 刃
雷忠勤	霍润德			

目 录

引 子 (1)

一、远古人类的诞生与初步发展 ... (2)

(一)远古时山西的地理环境与气候

..... (2)

【二】旧石器时代早期文化 (3)

【三】旧石器时代中期文化 (6)

(四)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小石器与细石

器文化 (9)

二、文明因素的积淀与发展

——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

..... (14)

(一)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 (14)

(二)仰韶时期的文化 (17)

(三)庙底沟二期文化 (21)

(四)龙山时代的文化成就与华夏文明

的形成 (22)

三、勃兴的夏商文化与繁荣的晋文化

..... (31)

(一)山西的夏部族文化 (31)

目

(二)丰富多彩的商文化	(33)
(三)勃兴繁荣的晋文化	(36)
四、独具特色的北朝文化	(49)
(一)城址	(49)
(二)墓葬	(51)
(三)佛教建筑	(52)
结 语	(53)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引 子

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也是惟一从古至今文化承接紧密从不间断的国家。这种文化“本身的连绵不断的历史过程，还包涵着大量可说明整个人类文化发展规律的一般性（即普遍性）内容。这种重要性，不是其他地区可以取代的。”因此，了解和研究中国古代文明就有着深远的历史意义和重要的现实意义。

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说过，埃及是尼罗河的赠礼。同样道理，中华民族也是黄河和长江的赠礼；与其他文明古国一样，中国也是一个在大河文明浇灌下发展起来的泱泱大国，黄河和长江就是我们的母亲河，她的发展和变迁正是中国文明发展的真实写照。

大量的考古资料证明，中国古代文明不是在一个地区一次形成的，而是在许多地区特别是黄河、长江流域长时间孕育多种文明因素的基础上，多次发生相互激荡和影响而最后形成的。由于中原地区处在若干文化圈的核心位置，很容易汲取不同文化的优秀因素，在迈向文明的进程中自然就走在了时代的前列。山西的南部是中原的组成部分，这里的考古学文化在中国古代文明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山西的北部已属于北方文化圈，系戎狄部落的活动区域，尔后的匈奴、鲜卑等游牧民族曾长期占据这里，并通过山西中南部进入中原，成为民族文化融和的一条重要通道。正因为这个缘

故,山西的考古学文化才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

山西考古学文化有三个明显的特色:一是高度发达的旧石器文化,二是勃兴灿烂的晋文化,三是独具特色的北朝文化。旧石器文化和新石器文化,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的基础;而晋文化则是作为华夏文化的主干及继承发展者而融入汉文化的洪流之中;北朝文化随着民族大融合的趋势也与汉族文化相融合,为中国的古代文明增添了勃勃生机。

一、远古人类的诞生与初步发展

大量的考古资料证实,最早的人类是由猿的一支逐渐演变而来的,距今380万年的东非肯尼亚人是迄今发现最早的人类化石。在中国,从南到北都发现了距今180万年的人类化石和石器,说明这里也是人类发源地之一。在介绍这些远古文化之前,有必要先介绍一下当时的地理环境。因为文化是人创造的,而地理环境则是人们从事生产和生活的基础;社会生产力水平愈低,人们对自然环境的依赖就愈强。

(一)远古时山西的地理环境与气候

自然地理环境由岩石圈、生物圈和大气圈组成,其中尤以大气圈对人类的影响最大,其不仅直接制约人类,同时还通过对生物圈和岩石圈的制约而影响人类的活动。

山西位于中国的中北部,其东越太行山与华北平原毗连,西与陕北高原隔河相望,北以外长城与内蒙古为界,南隔黄河与河南为邻。大致轮廓为一平行四边形,南北长680公里,东西

宽380公里。境内地形高低悬殊,大致可分为东部山地、中部盆地、西部高原三种地形地貌,平均海拔1 000米左右。在气候区划分上,虽属于东部季风区,但其西北部已与干旱区为邻。

大约从距今240万年至1万多年,是地质学上的第四纪时期,也就是考古学上的旧石器时代。这一时期气候波动较大,多次出现冰期或间冰期,冷、暖、干、湿错综交替出现。但总的来看,这一时期的早段气候特征主要是湿润,山西东西两侧到处都是郁郁葱葱的森林、灌木丛和草原,中部的盆地皆为湖水,宛如一串珍珠镶嵌其间。湿润温暖的气候与山青水秀的环境,成为许多大象和大熊猫及其它动物的理想栖息地。同时,也为人类的生存和繁衍提供了好的环境,山西现存如此之多的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存就是最好的例证。距今73万年至14万年时是中更新世时期,这一时期尽管在初末都有过一次冰期,但湿润温暖仍是其气候的主要特征。比较明显的是地理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山西中部的一系列湖泊已经萎缩,今日所见主要河流的河道已成雏形。到了距今14万年至1万年的晚更新世时期,气候开始形成四季分明的特色,山西南北部之间的差异也日趋鲜明。

(二)旧石器时代早期文化

西侯度遗址是迄今中国已知最古老的旧石器地点之一,距今已有约180万年。遗址位于芮城县西侯度村附近的黄河东岸台地上,经过1959年的调查和1961年的发掘,在早更新世的交错沙砾层中,发现了大批动物化石和32件石制品。动物化石的种属有鲤、巨河狸、剑齿象和犀、野牛等。这些动物早已灭绝,根据生活习性推断这里系四季分明疏林草原环境。32件石

制品分别为石核、石片、砍斫器、刮削器和尖状器，从刃部及石器整体形态来看，加工技术条理且较为先进，并不是石器最原始的形态。研究者贾兰坡、王建先生推论：中国最早的石器和人类化石应该到上新世的地层中去寻找。换句话说，中国最早的石器和人类也应该上溯到300 万年以前。值得注意的是，西侯度遗址中所发现的动物化石有许多被火烧过的骨、角、牙等，说明当时的人类已经懂得使用火，这是我国目前发现最早用火的痕迹，其意义之重要不言而喻。

匚河旧石器地点群是又一处重要遗址，分布在黄河东岸从永济市独头沟至芮城县涧口南沟长达10 余公里的范围内，共有17 个地点。经过1960 年的初步发掘，获得了一大批动物化石和138 件石制品，结合地层关系，确定该遗址属于中更新世早期，距今约六、七十万年，与北京人的时代相若或稍早一些。在发现的动物化石中，有大象和野猪，表明当时匚河一带有茂密的森林；鹿、马等食草动物的存在，说明附近还有广阔的草原；而从软体动物“对丽蚌”、水牛等来判断，附近亦有河流、湖泊与沼泽。水牛和象喜欢温暖湿润，而披毛犀是喜欢干燥，它们的同時存在，说明当时的气候比今天更加温暖湿润，与现在淮河流域的气候相似。匚河出土的石器除砍斫器、刮削器和大型三棱尖状器之外，还有小尖状器与石球。其中大尖状器为三面和三棱，为交互打击而成，是具有代表性的典型石器，很可能是一种挖掘工具。石球加工比较粗糙，重量在100 克以上，是用于狩猎的投掷武器。匚河文化的发现在中国旧石器考古学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它不仅填补了从西侯度遗址到丁村人文化之间的缺环，而且确立了中国华北旧石器时代

两大系列之一的“匭河——丁村”系列。

位于汾河中游东岸的丁村人遗址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一向以丰富而独特的旧石器时代中期文化而闻名中外。以丁村为中心的遗址群长达12公里，经过长达几十年的多次发掘，其文化内涵可分为早、中、晚三期，恰与旧石器时代的早、中、晚三期相对应。这里的旧石器早期地点分布在丁村附近的白马西沟、解村西沟、南寨塌河崖、上庄沟等处。1983年秋，在解村电灌站又进行了正式发掘，发现了200多件石制品和一大批动物化石，这些石器与化石都出自汾河第四级阶地的沙砾层中。出土的动物化石种属有纳玛象、犀牛、野马、斑鹿、鼯鼠和鱼类、蚌类等，说明其环境为疏林草原，气候温暖湿润。石制品的原料大部分为角质岩，中小型石核居多。制作石片的方法有锤击、砸击和投击三种，石器形状与匭河文化的种类形状基本一样。这些石器的形状和制作方法和丁村文化中期的石器一脉相承，是同一文化的不同的两个发展阶段。而这里的三棱大尖状器和厚大尖状器，其文化传统均能上溯到西侯度与匭河文化。

除了上述遗址之外，山西比较著名的旧石器早期遗址还有古交市的王家沟和后梁、大同的青瓷窑、垣曲南海峪的洞穴遗址、万荣县的西桌子、新绛的西马村、河津的北里、河曲的河会、榆社的墩圪塔和上西山及下西山、永济的介峪口和垣曲盆地的遗址群。这些遗址和地点在分布和文化内涵上均有如下共同点：1. 遗址或地点都分布在河流两侧的古老阶地上；2. 石制品和动物化石包含在沙砾层或红土层中；3. 动物化石的种属基本相同；4. 石器种类及加工方法类同。由此说明上述遗址

的环境气候的趋同决定了文化内涵的趋同，反映了早期原始人类对自然环境有着极强的依赖性。

(三)旧石器时代中期文化

距今13万年至4万多年是旧石器时代的中期阶段。这一时期的遗址和地点较前分布更为密集，几乎遍及山西的各个县市，但最具代表性规模最大的是丁村人文化和许家窑文化。从分布地域上看，一个在晋南的汾河流域，一个在晋北的桑干河流域；从文化体系上分析，一个是以大型三棱尖状器为代表的西侯度——匭河文化系列，一个是以刮削器、雕刻器等精小石器为代表的细小石器文化系列。所以，它们足以代表这一时期的文化面貌和发展水平。

丁村遗址群位于襄汾县城南侧的汾河两岸的第三级阶地上，从丁村往南至柴庄长达12公里范围内，有遗址、地点16处。伴随石制品出土的还有动物化石、人类化石和植物孢粉。动物化石有貉、披毛犀、梅花犀、野马、野驴、斑鹿、原始牛、纳玛象和印度象等27种。从发现的动物化石和地层来看，丁村遗址的地质学年代属于晚更新世早期，考古学年代为旧石器时代中期，距今约10万年。人类化石有3枚牙齿和1块头顶骨。3枚牙齿一枚为上内侧门齿，一枚为上外侧门齿，另一枚为右侧下臼齿。从其大小、颜色、石化程度及出土位置来看，3枚牙齿和头顶骨同属一个个体，为一年仅十二、三岁的少年，属蒙古人种。其进化程度比北京人先进，较现代人原始，是介于北京人和现代人之间的人类，应归入早期智人类型。经过对头顶骨的进一步研究，再次证明其和北京人及蒙古人种的亲缘关系。

丁村遗址出土了数以千计的石制器，可分为石核石器和

石片石器,后者在数量上居多。丁村的石片多用碰砧法和投击法制成,具有宽大于长、角度较大、打击点不集中、半锥体大且常常双生等特点,石核也比较大。但也有一定数量的石片是用石锤直接打制的,在一些石片上保留着修理台面的痕迹,这是一种比较先进的技术。石核、石器的种类有砍斫器、手斧和石球,砍斫器用两面交互打击法加工而成;手斧仅有一件采集品;石球是用石锤打击加工,制作技术与许家窑文化同类器加工技术不同。石片石器有砍斫器、厚尖状器、小尖状器和刮削器四类,砍斫器都在一面敲击刃部,且刃甚薄;厚尖状器又可分为三棱尖状器和鹤嘴式尖状器,这是丁村文化最典型的石器;小尖状器和刮削器都用薄石片制成,有的刃沿打制得相当平齐,显示了较高的工艺水平。值得一提的是在1976年的发掘中还发现了一件平面呈平行四边形的石锯,这是目前发现的年代最早且是旧石器时代唯一的石锯。丁村人文化是在继承西侯度、匭河、蓝田人文化传统的同时并有发展创新。

许家窑遗址位于桑干河上游的大同盆地北沿阳高县古城乡许家窑村东南1公里的梨益沟右侧,其文化层相当于泥河湾层的顶部,距地表深约8米,许家窑人当时生活环境为湖滨环境。1976年、1977年和1979年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曾进行了三次发掘,共获得2万多件石制品,20件人类化石,大量的动物化石和骨角器,这是至今山西发现人类化石最多的遗址。从动物化石和地层分析,许家窑人的年代距今10万年左右,为中更新世末或晚更新世初。

许家窑遗址发现的人体化石近20件,包括较完整的头顶骨3件,枕骨2件,附着部分牙齿的左上颌骨1件,还有许多牙

齿和头骨碎片,分别属于10多个不同的个体。这些人体的头骨相当厚,厚度超过了尼安特人的最大值,达到了北京人的平均值。再结合头骨其它方面的测定数据,一般都认为它具有直立人向早期智人过渡的性质。与其文化遗物的制作技术相比,人体的进化程度显然滞后。经研究证实,许家窑人的寿命比较短,平均年龄约20岁左右。文化遗物中石制品占绝大多数,总计2万多件,其中石器占20%,原料以石英、燧石和石英岩居多。石器类型多样,有各种形制的刮削器、尖状器、雕刻器、砍斫器、石钻和石球等,其中刮削器和石球的数量占绝对优势,前者占总数的55%,后者占总数的36%。已发现的石球1100多个,数量之多,无论在中国还是世界都极为罕见。最大的石球直径100毫米以上,重量超过1500克;最小的直径在50毫米以下,重量不足50克。这些石球既有制作得滚圆的成品,也有半成品和毛坯,从中可以清楚看到石球制作工艺的全过程。有人根据民族学的资料推测,小石球可能是狩猎工具——飞石索上的弹丸,大石球应该是一种投掷武器。许家窑人的石器除石球外,一般都是小器形,加工精细,其文化性质属于华北细小石器文化系统,是北京人文化和峙峪文化之间重要的过渡环节。石器的基本类型和加工技术与北京人十分相似,但有许多进步成份,例如,原始棱柱状石核、短身圆头刮削器和圆头的刮削——尖状器是北京人所没有的。另一方面,许家窑文化与峙峪文化虽然有很多共同性,但尚缺少后者的一些进步类型——成型的楔形石核、斧形小石刀、石镞等。许家窑的骨器有铲、三棱尖状器、刮削器和小尖状器。角器是作为挖掘工具并带有部分头骨的羚羊角。

(四)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小石器与细石器文化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人类利用、改造自然能力的不断提高,人类使用的生产工具越来越先进,不仅工具种类增多,且制作工艺也日趋先进。这一点从距今4万至1万多年的旧石器晚期的文化面貌中看得非常清楚。从目前发现的100余处旧石器晚期遗址都具有石器种类多、器形趋于细小化、制作工艺先进等共同特征,说明人类文化发展已经迈上了一个新台阶。大约从旧石器时代中期开始,山西的细小石器就已出现小石器和细石器的差别。不过,这种差别是初露端倪,以至于许多人将两者混为一谈。所谓细石器特指用间接打击方法获得的柳叶形薄石叶制作的细小石器;而小石器则是采用一般工艺制作的形体小巧的石器。两者还有一个重要的区别,前者都有柱形、锥形和楔状小石核,后者则没有。属于细石器文化系列的遗址有沁水县的下川、蒲县薛关、吉县柿子滩、襄汾的柴寺等;属于小石器文化系列的有朔城区的峙峪、陵川的塔水河以及分布在大同盆地边沿的许多遗址和地点。现择要介绍如下:

1. 小石器文化

峙峪遗址是小石器文化材料最丰富的遗址,也是中国旧石器时代最重要的遗址之一。其位于朔州市朔城区西北15公里的峙峪村附近,1963年发现并进行了发掘。遗址地层为晚更新世,考古学属旧石器时代晚期,距今约3万年左右。发掘所获的石制品共计2万余件,原料一律取自当地的砂砾层,有脉石英、石英岩、硅质灰岩、燧石和火成岩等。石核常见有两极石核和多面石核,石片有锤击石片、两极石片和小长石叶三种。制作技术既沿袭了北京人的砸击法,又使用了间接打击打制小

石叶的先进技术。石器以小石器为主,大型石器很少,砍砸器极为罕见。小石器通常修理得很规整,以尖状器、刮削器和雕刻器为多。刮削器形制复杂,有圆形、盘形、双边刃和单边刃等。其它石器如扇形石核、斧形小石刀和石镞,虽然数量不多,但在研究石器工艺方面具有重要意义。石镞是使用弓箭的标志,说明当时的狩猎技术有了长足发展;用半透明水晶制作的弧形刃小石刀,两平肩之间有短柄突出,说明其是作为复合工具的刃部镶嵌在骨柄或木柄上,从而显示其文化上的进步性。峙峪遗址与石器共存的动物化石往往十分密集,仅动物牙齿就有5 000余枚,还有大量被人为击碎的兽骨片。动物化石中数量最多的是野马和野驴,前者至少有120个个体,后者则有88个个体。很显然,这两种草原动物是当时人们猎取的主要对象。当时人们已经能够根据动物的活动习性,比较集中地捕获一两种动物,出现了狩猎专门化的倾向,这是人类劳动技能明显提高的标志。峙峪文化的发现,表明在华北地区至迟从北京人文化开始,就已经存在一种小石器文化,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愈发达,并成为华北地区典型细石器文化的先河,而峙峪文化就是其中的重要环节。

塔水河位于陵川县,遗址就在塔水河的上游,经多次调查,共获得2 000多件石制品和大量动物化石和人类化石碎片。对这些遗物进行综合分析,可知遗址的年代为旧石器时代晚期。石器的原料绝大部分是燧石,也有少部分脉英石。石器形体小巧,器形种类主要是刮削器和尖状器,其中刮削器不仅数量最多,而且种类也相当繁杂,全部用直接打制的石片修整而成。塔水河遗址地处晋东南,与西侯度、丁村遗址相距不远,

但在文化内涵却大相径庭,其文化性质与许家窑文化和峙峪文化一脉相承。

2. 细石器文化

细石器文化是山西旧石器中一个引人注目的类型,其中最典型的代表就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发现的下川文化和薛关遗址。

下川文化是中国旧石器时代晚期最后阶段的文化类型,因发现于山西沁水县的下川村而得名。与其同类的遗址多见于山腰间的盆地或山坡地带。下川遗址处在历山东麓的一个山间盆地,文化层分布在盆地的第二阶地地表以及阶地上层的晚更新世末期的灰褐色亚粘土层中。经放射性碳素测年,可知遗址距今2.4万年~1万多年,遗址年代的下限已经进入或接近新石器时代。经过20世纪70年代两次大规模的发掘,获得了一大批石制品。石器以细小石器为主,原料多为燧石。其类型多达40余种,石核有锥形、半锥形、柱形、楔形和漏斗状,都是比较典型的石核,石器有细石叶和各种刮削器、尖状器、雕刻器、琢背小刀、镞、锯、锥、钻等,其中不少器类是华北同时代遗址所共有的,也有一部分器类是这里所特有的。分析这些细石器的制作工艺,既有间接打击法制作修整的,也有一般工艺制作的,而以后者数量居多。其中有许多石器的制作技术是相当先进的,如石箭头都是用压制法制作的锐角和周边;琢背小刀则是在石叶的一侧刃部轻敲细琢,使其变得钝厚而成为刀背,保留另一侧的锋刃作为刀刃;锯是在石叶的一侧或两侧作出小齿,有的还带有短柄。雕刻器种类之多,制作之细,是其它同时期遗址望尘莫及的;小型的三棱尖状器是制作最精细

的微型尖状器，其长仅有2~3厘米，宽1厘米许，有尖有刃锋利无比，目睹者无不赞叹不已！下川文化也有少量的粗大石器，原料主要是砂岩和石英岩，器类有砍斫器、刮削器、石锤、砺石和石磨盘。石磨盘的出现，是采集经济相当发达或者原始农业出现的重要标志。

下川文化的细石器代表了旧石器时代石器制作工艺的最高水平。细石器的大量出现，表明当时已经比较普遍地使用了附加木柄的复合工具，细石器不仅适宜于镶嵌成刃、锯、短剑，而且还是弓箭、标枪等新式投掷武器的主要部件。生产力由此得到进一步的提高，社会经济开始了新的飞跃。

薛关遗址位于临汾市蒲县薛关镇附近的昕水河的左岸。经考古发掘，获得了4700多件石制品和一批哺乳动物化石，石器以细石器为主，未见磨制石器和陶片，碳14测定年代距今约1.3万年。所见石制品皆棱角锋利，未见流水磨蚀的痕迹，由此断定这是一处少见的原生旷野堆积遗址。细石器数量最多，原料系燧石、石英岩和角岩；也有少量的粗大石器，原料是砂岩和石英岩。细石器的种类多达30余种，有各式各样的典型细石核，有细石叶和用细石叶制成的刮削器、尖状器、雕刻器、琢背小刀、锥、钻等。刮削器数量最多，占总数的83%，可分为直刃、半月形刃、凸刃、多刃、龟背刃和端刃六种类型，刃口均很锋利。尖状器虽然数量不丰，但却是薛关遗址的典型器物，一般都是沿石片长轴由劈裂面向背面修理，并在最前端形成两侧对称的三棱状锐尖。其制作工艺是直接打击和间接打击两种方法兼用。大型石器的器类有石斧、半月形刮削器和石锛等，虽然数量不多，但与细石器的加工方法却是一致的。从文